

唐代隐逸圈的“陆浑水路”

何华



终南山距长安路程差不多相当，且水陆交通两利，这一区位优势，使其和终南山一样，成了文人士大夫隐居之地的理想选择。

陆浑山水相映，居此能得景色之幽。山水文化和隐逸文化密不可分，魏晋以降，寄情山水差不多成了隐逸的代名词。唐代的山水诗代表人物中，如王维、孟浩然、綦毋潜、常建、裴迪、储光羲、丘为等，本身都有过或长或短的隐居经历。而王维的山水诗，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表现隐逸之志。所以，寻找一方山水佳境诗意地栖居，是文人士大夫选取隐居之地的题中之义。陆浑群山叠翠，一水中激，境内有号称“九州之险”的三涂山（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），有山峻水幽的九皋山，景色奇绝。宋之问有诗云：“春泉鸣大壑，皓月吐层岑”（宋之问《夜饮东亭》，东亭在南陆浑），“源水看花入，幽林采药行”（宋之问《陆浑山庄》）。祖咏有诗：“昼眺伊川曲，岩间霁色明。浅沙平有路，流水漫无声。浴鸟沿波聚，潜鱼触钓惊。更怜春岸绿，幽意满前楹”（祖咏《陆浑水亭》）。岑参也称“陆浑山下佳可赏”（岑

参《送魏升卿擢第归东都，因怀魏校书、陆浑乔潭》）。可见陆浑的景色之美。

陆浑文化圈层次高，交流广，居此可得人力鼎力。陆浑文化圈是当时最顶级的文化圈之一。特别是从唐高宗建都洛阳到安史之乱前的上百年间，这里可以说是众星闪耀，群英荟萃。宋之问、杜甫、岑参在这里筑有山庄。元德秀是唐开元年间著名政治家、音乐家，时人誉以“琴台善政”，辞官后，隐居陆浑，传道授业，培养出了一批如萧颖士、李华、元结、李萼等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。杜甫的忘年交，曾任玄宗、肃宗两朝宰相的房琯，出任前与好友吕向在陆浑隐居达十年之久。吕向也是开元年间的政治家，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、书法家，与张说、贺知章等十八人号称上阳宫“食象亭十八学士”。李白曾在陆浑漫游。李白的叔父李清，隐居在陆浑五崖山，好友岑勋，隐居在陆浑鸣皋山。岑勋是《多宝塔感应碑》的碑文撰写者，也是李白《将进酒》中的岑夫子。后人关于《将进酒》的写作时间、地点一直有争议，根据李白的活动踪迹，陆浑也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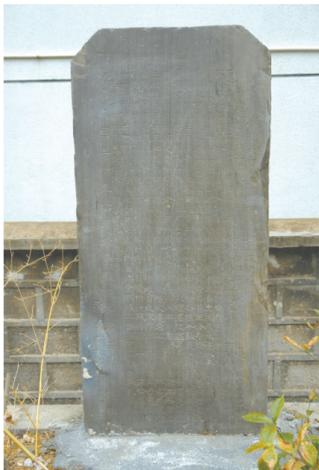
有可能是这一著名诗篇的诞生地。迨至中唐，白居易隐居龙门香山，陆浑就成为他经常的出游之地。此外，唐德宗时期的宰相郑珣瑜出任前也曾任陆浑隐居。有了这些人物的帮衬，陆浑就成为文人士大夫争相奔赴的理想隐居地。而陆浑又和嵩山山水相连，近在咫尺，两个文化圈气连枝同声相应，更扩大了彼此的影响力。所以跻身这一文化圈，就等于获得了巨大的人脉资源，对获取功名无疑会有极大的好处。“李白便是由曾经隐居嵩山的吴筠举荐才入朝为官的。岑参出仕也得到了杜甫的大力引荐。

陆浑历史文化资源厚重，陆浑的鸣皋山已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寄托。陆浑所在的伊河中游，历史悠久，上古为伊国、伊侯国，夏商为有莘之野，商相伊尹便出生在这里。周代为王畿之地，是《诗经》“周南”之风响应的地方。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”（《诗经·小雅·鹤鸣》），鸣皋山（即九皋山）已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寄居地。李白、李颀、王昌龄等都有咏鸣皋的诗篇。“饮马伊水中，白云鸣皋上”“远映村更失，孤高鹤来傍”（李颀《望鸣皋山白云寄洛阳卢主簿》）：“邀仙山之峻极兮，闻天籁之嘈嘈”“峰崢嶸以路绝，挂星辰于岩壑”（李白《鸣皋歌送岑征君》）；“忆昨鸣皋梦里还，手弄素月清潭间”“鸣皋微茫在何处，五崖峡水横樵路。身披翠云裘，袖拂紫烟去”（李白《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》）。在李白等人那里，鸣皋已不仅仅是一方栖居的山水胜境，更体现着诗人们不愿与俗流为伍的高尚情操，也寄托着诗人们要像鹤一样“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”的理想抱负。

因为这些地理和文化优势，陆浑遂成为唐代和终南山、嵩山并立的三大隐居地之一，成为众多文人士大夫趋之以往谋取功名的理想所在。及至宋代，陆浑文化圈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，尹洙、范仲淹、文彦博、司马光、邵雍等都曾在这里活动过。程颐、程颢晚年更是隐居在鸣皋山下，开办“伊皋书院”，弘扬理学思想，著名的“程门立雪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及至金代，诗人李俊民也长期在这里隐居。明清以降，随着隐逸文化的式微，特别是国家政治、文化中心之迁移，陆浑文化圈盛况不再，只有日夜不停的伊河水似还在诉说着当年的繁华。

烽火烈焰的羊角岭古道

黎笑



《修筑天目山羊角岭路孝丰段碑记》



羊角岭古道

安吉，位于天目山之阴，太湖之阳，南北通衢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史料记载，在安吉境内天目山东西两支山脉中，曾建有关隘18座，是为防御北方民族入侵而建的重要军事设施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独松关，巍然挺立在安吉与余杭交界的独松岭上。而与关隘唇齿相依的古道，以线性文化遗产的特殊身份，在安吉绿水青山间仍多有分布。据统计，长度在1公里以上的古道尚存66条，保存基本完整。历史上，这些古道承担了在军事或在邮驿和交通等方面的功能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其中，羊角岭古道以其线路长、保存好、环境优美、内涵深而独树一帜。

羊角岭古道，位于安吉县报福镇深溪村冰坑至姜家里的羊角岭山路上。从立于深王线（深溪至龙王山公路）冰坑电站旁的《修筑天目山羊角岭路孝丰段碑记》得知，此道修筑于1941年，时为运送抗战军和抗战物资而建（亦称“抗战大道”）。古道界于孝丰于潜两县（古县名，今分别为安吉县和杭州市临安区）之间，全长30公里，其中孝丰境17.5公里。如今，该古道安吉境内保存完整段为冰坑至杨树边约8公里长。

站在冰坑向东南仰望古道穿越的山顶，两座山峰似羊角状耸立，故名羊角岭。古道穿行于峡谷东侧西北向东南走向的山体上，相对高差约600米。冰坑至姜家里段隔峡谷西面为龙王庙至泥岭的山崖，古道至峡谷底相对高度约20米。

古道沿羊角岭山体从山脚向山岭蜿蜒曲折而上，沿途穿过2处毛竹林、2处小竹林、1处松树林、1处杂柴林和3处石浪。该地生物多样，地质复杂，有竹林密布、树木林立；有黄土泥沙、石浪漫川；有巨石耸立、峭壁悬崖，还有沟壑峡谷、溪水潺潺。古道用自然山石铺就，依山体平缓时平铺，陡峭时设阶，遇峭壁开凿，跨沟壑架桥，逢巨石绕道，过石浪修整，时而穿梭在茂密的竹林间，时而蜿蜒于荒芜的山岗上，犹如一条长龙，匍匐在绿水青山间。经过风霜雨打、寒暑淬炼，承受烽火硝烟、万人践踏，灰黑、光滑、圆润、洁净的路面彰显出古道坚韧不拔的品性。

作为一条历史上孝丰（安吉）通往天目的主要陆路通道，该古道的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，但据相关史料记载，1861年2月23日，驻扎在孝丰的太平军经报福翻越羊角岭，增援于潜的太平军，于2月25日重新夺回临安，走的就是羊角岭古道。由此证明，古道在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已存在，1941年在原有古道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和扩建。

修建后的抗战大道，见证了一段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历史。史料记载，1943年10月19日，侵华日军2000人分两股向告岭和羊角岭进犯，国民革命军第28军62师和192师猛烈反击，压敌退回冰坑。24日，敌军倾巢出动，再犯告岭和羊角

岭，他们乘28军换防之际，窜上告岭头、仰天坪、檀树岗等地，62师火速占领茅草山和高尖，安置重炮，对敌猛轰。25日拂晓，国民革命军全线猛烈反攻，敌军阵线动摇，向告岭溃退，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在25日克复章村后迅速北进，包抄敌军南进基地报福镇，敌军见羊角岭方向有路难归，大部向董岭、统里夺路逃命。27日，国民革命军连续克复统里、报福、老石坎。28日，炮轰孝丰城，歼敌1200人，残敌北向泗安溃窜。

羊角岭古道作为一条军事要道，不仅留下了抗日志士的战斗足迹，亦洒下了英勇烈士的鲜血，高奏着一曲曲不畏艰难、不怕牺牲的红色赞歌。《中国共产党安吉简史》载：1937年红军上浙皖特委独立营转战在浙皖地区（安徽泾县、宣城、宁国、广德、郎溪和浙江孝丰、於潜、昌化八县）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无数次的交锋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奇袭昌化城、於潜遭战、奋战石壁山等战斗，羊角岭古道成为红军独立营来往的重要通道。曾任中共梅溪区委妇女委员的龚玉贞，在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因叛徒告密而遭捕，后被营救出狱，继续进行革命斗争。1940年10月再次被捕，在狱中继续坚持斗争，发展共产党员。1942年2月28日，受尽酷刑的她被害于羊角岭脚下的东关，年仅20岁。

据安吉县博物馆藏《新四军在安吉活动情况》（1975年）记录：1945年3月，新四军苏浙军区天目山反顽第二次战役打响，其中新四军“巧夺天目山”战斗就在羊角岭古道发生。时新四军2个团向盘踞在羊角岭山上的顽军3个突击营（相当于3个团）发起进攻。经过4天3夜的战斗，最终新四军消灭了顽军的两个半突击营，余敌向临安方向逃窜。粟裕将军在《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》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在东、西天目山之间都有一个叫羊角岭的地方，西边山峰陡峭，中间仅有一条山路可通。小路一边是深涧，地势非常险要。（敌人）只要在这里派重兵坚守，用火力封锁隘口就万夫莫开。但顽军兵败如山倒，竟不敢在此据险抵抗。我第二支队尾随紧追，乘机巧夺了这个险要之地。”借助羊角岭，新四军追击顽军一直到临安城，顽军挡不住势如破竹的新四军，便放弃了临安。最后，新四军完全占领天目山，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反顽战役。

在绿水青山间静悄悄了千百年的羊角岭古道，受现代交通设施建设飞速发展的影响，曾一度荒凉冷落、无人问津。如今，伴随着“亲山水、走古道”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拓展，羊角岭古道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。当地政府顺势而为，对古道进行全面修整，深入挖掘弘扬古道内涵。目前，羊角岭古道已成为安吉红色旅游的热门“打卡”点。

姜里

王业群

记不清楚究竟多少次了，从前每逢乘火车，后来是高铁，由南向北，过郑州继续行驶不到两百公里，接近河南汤阴地界时，我都会透过列车车窗，神情专注地朝东面方向望，期待能在不远处见到竖在那的一块地名牌，上面写着“姜里”二字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地名无疑具有十分强的吸引力，每次见了都不由肃然起敬。

三千多年前，姜里曾充当过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的开创性人物——周文王姬昌，从而诞生了中国文化史上名传千古的第一篇章、居于五经之首的《易经》，这里是周易文化的发源地。

据《姜里城志》记载，姜里城属3000年前殷商时期的遗址，位于汤阴县城北4公里、姜河村东0.5公里处；南北106米，东西103米，面积10918平方米，高出地面5米许；北界姜河，南临汤水。殷商后期，这里曾经是国都近郊，也是现存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座最古老的国家监狱。

查文王姬昌年谱，他是在纣辛十年（公元前1065年）82岁时，被殷纣王拘于姜里的。此时他不仅已在周地享有广泛拥戴，就连殷朝本国人也萌生了趋附之意，担心因此而危及殷朝统治，殷纣王听信了崇侯虎的谗言，将姬昌囚禁在了姜里，长达7年之久。7年之后，姬昌近臣以美女、良马和奇珍异宝贿赂殷纣王，使姬昌得到豁免释放。

也是在被囚的这7年时间里，姬昌潜心钻研《易》之八卦，并将其推演为六十四卦，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司马迁说的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”，指的就是这件事。

姬昌获释后，励精图治，发愤图强，使周日渐隆盛，并自岐下迁都到了丰（今陕西户县东）；97岁时，姬昌逝世，儿子姬发继位，数年后与殷朝军队在牧野展开大战，灭掉了殷朝，殷纣王自焚而死。

可想而知，这样一个地方，当你即将靠近它的时候，心里面会产生多少好奇。可一旦当你真正到了它跟前，一切好奇都随之释然的时候，又会觉得，除遗址的真实所处之外，历史留在这里的，不过只是一片厚厚的覆土层，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唯独只剩下时间还是凝固的。

毕竟，这中间的年代隔得太久远了。今天的姜里，部分景观为重修或复建，部分则完全属于新建。从远处可以见到，城前广场立了一尊花岗岩质的文王塑像；塑像后的牌坊即演易坊，位于文王庙的大门外。大门两侧各有一碑，右侧为周文王姜里城碑，左侧为禹碑。

文王庙大殿位于城中央位置，属文王演易的主殿堂，正中是文王的坐姿铜塑像。文王演易之处，在大殿右后侧的演易台。台后有一圆形墓冢，墓碑刻“伯邑考之墓”。相传为纣王用文王子伯邑考的肉做成羹让文王吃，以试其是否胸怀大志；文王明知其中有诈，也猜到羹可能会是用自己儿子肉做的，却不得不强忍苦楚吃了下去，不久呕吐而出，后人便在他呕吐的地方垒了一冢，取名“吐儿冢”。

2018年夏天，我来到姜里时听司机说了当地一个至今仍保留的民俗——不猎杀野兔，它和这座“吐儿冢”有关。传说文王将吃进肚子里的羹吐出来后，见其蠕动，便说了句：“莫非我还能成兔乎？”话音刚落，就见吐物果真变成一只兔子跑了。人们从此不猎杀附近野兔，是因为认为兔子乃文王儿身所变之故。

姜里城内现存的一眼古井，据传是文王当年被囚时用过的井。立于井边，游人尽可以自己丰富的想象，去还原当年文王在这里生活的情景：一个心怀大志的人，当身陷囹圄，被困在这荒郊野岭，且随时都面临拘押他那个暴君喜怒无常造成的危险时，其意志的磨砺该会有多大。

夏季的中原大地，青纱帐早已撑起，只是长势参差不齐；有的地里，玉米已攀升到了一人高，有的不过还只一二尺许。中午时分，天气酷热难当，姜里城内的树木既稀且小，更是显得暑气蒸腾，炙热的阳光烤得人脸和肩都有种被灼痛的感觉；只有当避至城外稀疏的小杨树林，一丝阴

凉袭上身之后，才舒服了许多。

文王为什么要把伏羲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？《易经》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？它为什么会在中国社会产生那样大的影响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学术上一直在探讨，也一直有争论。笔者个人观点，无论是伏羲创八卦，还是文王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，其主要目的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为给人们提供一个了解事物和认识事物的方法，体现了我们民族先贤对事物发生、发展规律所做的探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将《易经》归属为一部思维方面的工具书，应该是恰如其分的；它里面包含相当丰富的逻辑思维成分，显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光辉。

一旦说到对事物发生、发展规律进行探寻，就必不可免地会涉及思维的一种常见方式——用抽象符号作为相应概念的代表进行逻辑推演。八卦和六十四卦的逻辑推演，就是如此，它们都用一实一虚两条线代表一阴一阳两个概念符号，即阴爻和阳爻，来表示对立统一关系在各种条件下的相互转化，这是易学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，也是文王为什么要将之前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，形成一个更加完备体系的原因所在，或是在考量过程中，他发现了其间存在的数理关系。

了解到这点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创立二进制数学体系——用“0”和“1”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的过程中，是受到了《易经》的启发。因为六十四卦图中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所构成的体系，恰让他发现了自己想要的证实东西的存在。同样，20世纪40年代初，中国在法国留学的四川籍大学生刘子华，之所以能推算出太阳系应该还存在着第十颗行星木星，比80年代美国科学家的实际观测结果还早了40年，据说也是从易学数理原则中得到的启迪（以上二例均见《易经新论》，周山著）。《易经》的厉害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但是，以此便认为《易经》可以无所不包，笔者并不认同。其他姑且不论，但就它推理的前提：取卦，用的毕竟是中国最古老的占事方法——卜筮这点看，就会有很大的随机性，自然也就无法令人完全信服，这是《易经》的一个明显局限。其次，《易经》以卦象来比喻事理的方法，笔者以为也是有所欠缺的，理由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说的那样，因为它“是经验的、直观的、具有牵强附会的成分”（张立文：《周易与中国文化》）。

可见，《易经》所以在中国社会影响巨大，其实还包括了另一因素，即农耕文明对自然及所谓天命与生俱来的认知感。《易经》的卜筮和卦象比喻，无疑使它身上披了一层较为神秘和诡异的外纱。

可附带提一笔的是，根据《周礼·春官·宗伯》记载的“大卜……掌三《易》之法，一曰《连山》，二曰《归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”，学者过去普遍认为，如果《周礼》所载不虚的话，《连山》应属于夏代之物，《归藏》应属于殷代之物。可喜的是，两易之一中的《归藏》，终于在20世纪后期湖北荆州市家台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了，由此证实了《周礼》所载的大致不虚；也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，文王推演《易经》其实并不是孤立的，在他所处年代的前后，易学应该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，学者在对《归藏》和《周易》中就发现，两者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。

<p>科技保护</p> <p>环境监控、本体监测、预警评估</p>	<p>科学管理</p> <p>资产管理、人员管理、咨询服务</p>	<p>创新服务</p> <p>科技文定、定位导览、数字化采集</p>	<p>遗址</p> <p>博物馆</p> <p>发掘现场</p> <p>档案馆</p> <p>图书馆</p> <p>旅游景区</p>
<p>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</p> <p>西安元智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., Ltd.</p>	<p>联系人: 张磊 13572270596 电话: 029-8346392 官网: www.microwise-system.com 邮箱: info@microwise-system.com</p>	<p>官方网站</p> <p>官方微信</p>	